

編輯室報告

一次關於新聞專業、專業主義的複習

張文強*

專業、專業主義，是老概念。在經歷過去一番熱烈討論後，我們不難從當下許多論文題目就包含著「專業」兩字的事實發現，這組老概念已然穩定成為學術場域一部分。教科書對於新聞工作描述也證明「專業」穩定融入新聞相關論述，成為學術場域想像新聞工作的標準。

不過特別是在台灣，這種穩定的背後隱藏著兩個需要處理的秘密，首先，我們需要知道即便在過去，新聞工作都難以完備專業的嚴格要件，實務場域總是用不同方式反諷專業與專業主義的存在。其次，這種穩定也實際指向當下學術場域對於專業、專業主義採取的存而不論狀態。原則上，在外在環境沒有大變動的狀況下，存而不論的確可以是種學術研究策略，不過近幾年新科技、社群媒體劇烈變化的趨勢卻也實際敦促著學術場域回頭聚焦專業、專業主義的必要性。當新科技、社群媒體替傳播工作創造出豐沛的演化能量，各種文類得以不斷增生、混種；當視覺、娛樂、情緒經過演化淘選，取代了事實、理性批判、公共性等現代性基因，以致傳統新聞像是瀕臨滅絕的物種，在各種不利生存的外在情境下，若我們還是認可傳統新聞的價值，還是期待新聞工作者應該具有專業的可能性，那麼，藉由回頭複習新聞是專業的由來，並且嘗試復興被忽略的專業主義，或許可以為這組老概念帶引出新的意義與未來，至少是一次保護傳統新聞瀕臨滅絕危機的嘗試。

壹、新聞是不是專業？

在美國，大眾化報業於十九世紀中期興起，帶動了現代新聞與新聞這

*張文強為輔仁大學新聞傳播系教授。聯絡方式：049214@mail.fju.edu.tw

種職業的出現，隨後，為回應黃色新聞引發的各種批評與反思，諸如資訊取向新聞的出現（Schudson, 1978）、報人普立茲於大學設立新聞學院等作為，開啟了二十世紀初期新聞工作專業化的過程，企圖克服新聞工作的社會污名，並嘗試將新聞從技藝工作轉向專業工作。雖然新聞工作的專業化企圖有其獨特歷史脈絡，但專業化問題也廣義發生於其他行業，是社會學關心的議題，而相關社會學研究結果更成為 1960 年代討論新聞工作專業化的基礎（錢玉芬，1998）。

如果用最簡單的方法加以說明，有關專業的討論大概可以區分成結構功能論（或稱特質取向）與權力兩種取向（Allison, 1986；羅文輝，1996，1998）¹。其中，結構功能論取向嘗試界定專業具備哪些特質，藉此將專業與其他職業區分開來。這部分討論眾多（例如 Barber, 1963；Greenwood, 1957；Wilensky, 1964），以 Greenwood（1957）為例，便指出專業具有五項特質：（一）具有系統性的理論；（二）在委託關係中具有權威；（三）需有社群認可；（四）具有倫理的管制規範；（五）具有專業文化。

而 McLeod 與 Hawley（1964：530）在發展新聞專業性（professionalism）量表時，則主張專業需要符合八項標準：

- （一）專業提供的是獨特與重要的服務；
- （二）強調專門的智能技術；
- （三）具有長期專業訓練，以獲得以研究為基礎的系統知識；
- （四）需要被賦予廣泛的自主權；
- （五）專業人員在工作判斷和行為上需要負起個人責任；
- （六）強調服務甚於個人經濟利益；
- （七）需要發展全面性的專業自治組織；
- （八）必須具有藉由實際個案進行澄清及解釋的倫理規範。

又或者，國內學者羅文輝（1998）則將專業性區分成以下四個主要構面，每個構面又包含兩個次要構面：專業知識（包含專門知識與自我充實）、

¹除權力與結構功能論取向外，還具有其他討論專業的方式，例如 Malin（2017）藉由以下幾種理論架構討論專業人員如何發展認同：（一）新涂爾幹式取向（Neo-Durkheimian）；（二）新韋伯式取向（Neo-Weberian）；（三）新馬克斯式取向（Neo-Marxist）；（四）後結構主義取向（Eclectic/post-structuralist）；（五）管理主義取向（Managerialism）；（六）民主或合作式專業取向（Democratic or collaborative professionalism）。

專業自主（包含內在自主與外在自主）、專業承諾（包含工作承諾與大眾服務）、專業責任（包含新聞責任與倫理責任）。

基本上，特質取向研究有助我們釐清一般職業與專業間的差別，最能回答新聞工作是不是專業這個問題；可以用來區分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性格高低，而且藉由與專業特質的實際比對，理論上是讓新聞工作認清自己不足，更加朝向專業發展邁進的方式，例如在比對之後，更努力於投入新聞工作專業知識的建立與訓練、發展屬於新聞工作的專業自治組織，努力強化新聞專業倫理等。只不過麻煩的是，在充滿動態的實務環境中，看似簡明俐落的特質取向研究，卻也造就了新聞工作的尷尬位置：新聞企圖成為專業，但卻無法完備專業的所有標準。也因此，類似社工、醫療照護的半專業（semi-professions）位置，新聞成為一種 Barber（1963，轉引自羅文輝，1996）描述的「逐漸成形的專業」。

貳、以「專業」想像新聞工作

即便新聞工作仍是一種「逐漸成形的專業」，但隨著時間開展，McLeod 與 Hawley（1964）有關新聞工作專業性的關鍵量表，Johnstone 等人（1972）有關中立與鼓吹兩種專業義理，以及從這兩組研究延伸出來的眾多後續研究，像是在說明經歷一番討論後，無論實務場域現狀與所持立場為何，至少學術場域普遍接受了新聞「應該」是專業的命題。新聞教科書亦是例證，是依照專業而非實務現場來教導與想像新聞工作。

在社會也普遍認可的狀況下，「專業」賦予了記者獨特的文化位置，新聞工作則被放入公共與政治脈絡中（McNair, 2005），成為強調公共、事實、獨立自主、多元的工作，而這些構面也具體構成想像新聞專業的實際內容。當下，或許更適合的說法是，新聞專業是以一套完整論述形式出現。這套完整論述一方面掠過實質條件不扎實的狀況，用細緻的應然面論述內容，宣告新聞是個專業，然後使得新聞專業相較於正統專業，具有濃厚的理論、象徵成分，並且讓它在實務場域的實踐經驗顯得浮動，爭議不斷。另一方面，這套論述也主導了對於新聞工作的想像，特別就實務工作者來說，又再因為專業做為價值系統或意識形態的功能（Evetts, 2003），讓他們得以凝聚出一種理論上以專業為核心的想像社群。而這種想像社群在兩個層面對

應著有關專業權力取向研究的描述。

首先，延伸 **Abbott (1983)** 對於專業倫理的觀察來看，我們發現，即便不是專業，但是藉由將自己想像成專業，可以幫忙新聞工作宣稱自己能夠進行專業自律，不須外界干預，藉此創造新聞工作所需要的獨立自主性格。當然，除了這種理論上的宣稱外，對於以專業自持的新聞工作者來說，專業整套倫理、知識、文化系統更具有實質性的規訓能力，規範著他們應該做什麼、不能做什麼。也就是說，專業做為一套價值系統或意識形態，為實質不專業的新聞工作形塑出一種鬆散的封閉式社群，在其中，新聞工作者理論上可以堅持獨立自主，進行自我規範、自我控制或自我規訓，再產製出社會需要的專業新聞。不過也不可否認地，在極端狀況下，某些專業的封閉社群可能因為證照制度的落實，而成為壟斷市場的機制，例如透過嚴格審核新進成員資格與數目，維持專業的既有利益。

其次，專業不只可以做為自我規範機制，由於相同行業專業人員擁有類似知識、技能、價值觀，因此理論上，他們可以利用共同的專業背景進行工作協調，形塑出一種專業組織構型 (**Mintzberg, 1979**)，藉此減少科層組織進行垂直控制的可能性。換個說法，專業主義可以做為一種職業控制方式 (**Freidson, 2001**)，理論上，新聞工作者可以藉由自我管理，以維護工作自主的主張。然而就實務工作來看，專業這種自我管理機制卻經常事與願違地反過來被組織收編，成為被組織所用的管理機制。而這裡又具有兩個相互連動的關鍵，其一，如同組織研究發現，管理者可以透過導引員工發展團隊間的價值共識，讓員工進行自我控制 (**Barker, 1993**)；某些知識密集公司雖然直接控制相對不多，但會透過共享的文化與價值觀形成員工間的規範性控制 (**Deetz, 1998**)；再或者，某些公司會利用菁英認同，讓員工自我規訓，對組織忠誠 (**Alvesson & Robertson, 2006**)。我們主張，雖然新聞工作得以透過自我管理取得一定免於組織干預的可能性，但是當新聞工作者愈是以專業想像自持，組織也就愈能利用新聞工作者自我管理的動力，組合出一種看似開放、尊重新聞工作者，卻又能實質控制員工、減少平日管理成本的管理方式。其次，不同於醫生這項正統專業，因為新聞工作者必須「靠行」、必須在組織內工作，所以強調獨立自主的他們，終究難以逃脫被管理的命運。差別在於較為善意的老闆，可能賦予新聞工作者較

大自主空間，較為威權的老闆則展現更為強大的權力意志，縮減新聞工作自主空間。也因此，國外研究也發現（Doolin, 2002），當管理主義愈加盛行，挑戰醫學專業時，即便是醫生也會面對自我認同等問題。或者這也解釋了文人辦報之後，經濟困境讓台灣報社對新聞工作者控制愈加緊密的事實。

參、新聞專業移植與新聞專業的實踐經驗

新聞實質不屬於專業的事實，以及前面多次使用「理論上」這個字眼，不只凸顯當下新聞專業的應然面性格，在新聞專業是移植而來的台灣，更實際提醒著有關新聞專業的討論，還需要考慮專業實踐時的衝撞與困境才算完整。也因此，順著前面偏向學術、理論式的論述，這裡將進入台灣新聞專業的實踐經驗，說明幾項我們的觀察。

整體來說，專業、專業主義由外移植而來的事實，是理解台灣專業實踐經驗時不可或缺的因素。蘇蘅（2018）在本期論文便描述台灣引進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過程，奠基於西方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基礎的專業主義，如何因為台灣政治、經濟因素而無法完整、穩定發展。而本文主張，觀念移植本來就有橘逾淮為枳的疑慮，就新聞專業實踐來說，特別是在無法擺脫政治控制的戒嚴時期，想要完美移植西方新聞專業到台灣更是極為艱鉅的事情，質變似乎不可避免。例如新聞評議會的設立便難以逃脫威權與侍從主義的陰影。不過即便移植過程有著橘逾淮為枳的疑慮，或如蘇蘅（2018）指出專業主義在台灣的發展並未抓到自主這個核心概念，但對早年習慣於威權報業體制，並夾雜文人辦報傳統的台灣新聞場域而言，新聞專業的引進仍可被視為一次關於新聞工作的改造企圖。

英美新聞專業除了奠基於西方社會言論自由脈絡，其實際發展過程更具有原生於實務場域的特徵。例如前述美國實務場域對於黃色新聞的反思，促成資訊取向新聞與故事取向新聞的區分，以及大學新聞科系的成立。在英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期成立的皇家特許新聞人員學會（Chartered Institute of Journalists）亦在推動新聞工作自身地位的提升，以及改善新聞從業人員的能力條件，之後新聞從業人員間更實際出現工會路線與專業路線的分裂（Aldridge & Evetts, 2003）。而相較於英美新聞專業發展過程中，

實務場域扮演關鍵角色，我們主張在台灣，因為新聞專業是一種觀念移植，而且是在迥異於新聞自由的社會脈絡中進行移植，所以就新聞專業的具體實踐經驗來說，學術場域扮演著更為吃重的角色，引介、甚至引領新聞專業的整個移植過程，透過新聞教育進行啟蒙，逐步建立新聞工作者的專業意識。解嚴後，台灣媒體的發展似乎便一度見證著新聞教育的啟蒙成果。不過儘管如此，新聞專業在台灣的實踐終究沒有因此一帆風順，在專業來不及生根的狀態下，隨後激烈的商業競爭又將台灣新聞場域帶離專業標準，直至今日。

移植而非內生的事實，讓台灣的新聞專業更像是學術場域鼓吹的一種想像，而專業的想像與專業的實踐之間也更顯分裂。對原本就不具相關基因的新聞實務場域來說，現實的政治、經濟，甚至是科技因素才是主導台灣新聞實務場域的真實力量。我們主張，這種狀況解釋了台灣新聞專業實踐過程難以捉摸的原因，在過去，專業依附政治威權而生；在當下，專業一詞雖已耳熟能詳，或已成為提升行業價值的修辭，但實質上，新聞媒體卻依照商業法則行事。當然，如果我們因此主張台灣新聞實務場域全然缺乏專業意識不盡公平，例如解嚴前後，不少新聞工作者便展現專業主義的濃厚企圖。

或者換個說法，移植而非內生的事實促成一種兵分兩路的專業狀態，學術場域跟隨與引進西方路徑，持續用學術式專業做為標準想像新聞工作，並且在不同時期用不同方式批判實務工作不夠專業。相對地，就台灣實務場域來說，在第一階段，跟隨專業的啟蒙與改造，缺乏專業基因的實務場域，像是用草根方式發展出一種屬於自己的實務式專業。這種情形特別展現在經歷新聞黃金年代的資深記者身上（張文強，2015），部分資深記者認為自己是專業，懷抱專業理想，也同意新聞要客觀、第四權、獨立自主這些基本說法，但重要的是，在摻雜學術式專業成分之下，他們指涉的專業並不同於學術場域描繪的新聞專業，而是一種憑藉經驗累積，長期經營路線，深耕新聞工作的實務式專業，這種實務式專業務實地促成資深記者的名聲與榮光，然後再回頭讓他們做出自我要求，成就自己做為專業工作者的想像。只不過跟隨時代發展進入第二階段，在資本主義強力進駐新聞實務場域，而新聞學術教學與研究也更形多樣化，稀釋對於新聞專業的關注

之後，一方面學術場域對於新聞專業開始抱持存而不論的態度，或就是以學術式專業批判、質疑實務場域各種作法，以致經常發生與實務場域對不上話的情形。另一方面，專業雖然成為實務工作者耳熟能詳的字眼，但因為實務式專業無法再帶來以往的好處，以致新聞工作者亦失去經營實務式專業的機會與意願，然後轉向一種無專業狀態，就是把新聞工作當成行業，就是做完每日工作而已。至此，學術式專業或實務式專業似乎都失去在實務場域的著力點。

肆、新聞專業在台灣的實踐困境

在台灣，在實務場域大多數時候緘默，有時支持，至少不公開反對的狀況下，新聞專業說法雖然沒有經歷太多檯面上的挑戰與叫陣，但因應不同時空情境，解嚴之後，從學術角度來看，台灣新聞專業大致經歷了兩階段的實踐困境。

一、內部新聞自主與新聞專業的實踐困境

第一階段困境大致落在老闆、科層組織與內部工作自主之上。解嚴之後，台灣蓄勢待發的新聞專業對於內部新聞自主問題特別關心，在自主本來便是專業核心（蘇蘅，2018；Ettema, Whitney, & Wackman, 1987；Deuze, 2005；Waisbord, 2013）的狀況下，我們主張，這種關心具有某種在地性，與當時學者、實務工作者與社會大眾厭惡政黨控制媒體有關，也涉及當時新聞專業的啟蒙與改造企圖，然後在眾多學術討論與幾件個案之間，這項關心最終具體反映在 1994 年因自立晚報經營權易主引發的編輯室公約運動之上（涂建豐，1996）。雖然這場運動最後未竟全功，但它的確成功集結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的共同參與，之後促成「台灣記者新聞協會」的組成，成為實務場域推動新聞專業的力量（何榮幸，1996）²。

這場運動明白凸顯著政治經濟學式對於媒體結構所有權的擔憂，但更為根本地，它更寓意深遠地說明著新聞工作需要「靠行」，受雇於組織的兩難。因為受雇於組織，所以新聞工作者與其他行業員工一樣，需要面對組

²編輯室公約、新聞自主與內部新聞自由等議題，請參考《新聞學研究》（1996）第 52 期。

織分工、接受垂直指揮，需要與長官、同事互動，然後在這種新聞產製實務情境中，科層組織存在的事實無可避免地會對正統專業要求的工作自主性產生負面影響。而且愈是考量生存因素，老闆的偏好與商業法則愈是全面性領導科層組織運作，例如之後台灣媒體環境的急遽惡化，想要逆勢對抗的企圖也會愈少愈困難。不過值得說明的是，除了內部自主的追求，對應專業對於系統化知識的要求，這時期新聞專業的實踐也落實在知識系統的建立之上，例如鍾蔚文、臧國仁與陳百齡（1995）針對新聞系學生應該學什麼的討論，便說明學術場域從知識面改造新聞工作的意圖。

二、商業化與新聞自主的實踐困境

第二階段專業實踐困境則落於資本主義的盛行上。卓越新聞獎基金會於 2008 年出版《關鍵力量的沉淪：回首報業解除二十年》（卓越新聞獎基金會，2008），總結了報禁解除後十多年，商業勢力全面進駐對新聞專業實踐的負面影響，而這段期間有關每分鐘收視率（林照真，2009）或置入行銷的批評討論（陳炳宏 2005；劉惠苓，2005）³，以及評批之後依舊存在的事實，除了證明新聞專業在實務場域敗下陣來，在媒體與新聞工作者都需要生存的現實理由下，各種商業作為不只是新聞工作的外部威脅，更回頭轉變成內部新聞自主的壓力，讓原本就得面對的科層組織困境變得更加嚴峻。具有上階段工作經驗的資深新聞工作者便實際感受到來自組織更大的壓力，得開始去做業配新聞，並且接受各種來自長官的指示與要求。然後隨著部分記者掛冠離去，久而久之，至少就具體的實務表現來看，實務場域被商業邏輯全面佔領，甚至實務式專業也不再重要，幾乎呈現一種實務場域的無專業狀態。

伍、正在發生的問題：新聞專業社群的瓦解或再凝聚

整體來說，無論是因為專業具有利他主義的理想，或可以藉此提高行業價值，新聞專業具有凝聚新聞工作者的作用，借用 Meyers 與 Davidson（2016）的說法，新聞專業預設了新聞工作應該做什麼，新聞工作者則藉

³置入行銷議題，請參考《中華傳播學刊》（2005）第 8 期。

由共享這套論述統一起來，形成一個理論上的詮釋社群。

然而如前所述，在台灣，專業是移植而非內生的狀態下，前面兩段實踐經驗殘酷地說明專業移植過程並不成功，特別是時至今日，實務場域似乎就是去走自己的路，並未有效凝聚出以專業為主的社群。相對地，這種理論上的社群反而像是出現在學術場域，凝聚了學者們對於新聞工作的集體想像，然後形成學術場域用專業標準批判實務場域，但是卻愈來愈顯一廂情願的情形。只不過即便新聞專業愈加變成學術場域的想像，媒體環境轉變也挑動這種想像的合法性問題。我們主張，接下來新聞專業的發展有兩項值得注意的關鍵。

首先，新聞專業具有濃厚的現代性性格，需要搭配著以往社會對於倫理的尊崇，以及一種行動者間的集體意識做為支援。不過隨著社會進入後現代脈絡，當倫理不再是美德、不再被尊崇，而集體性也更加破碎，個人意識成為主流，現代性的新聞專業在後現代脈絡中自然失去理論上的合法性，更實際失去在實務場域集體號召新聞工作者，凝聚出專業社群的可能性。也因此，當下面對的不只是專業影響力減弱的問題，而是如果一項職業或專業仍有凝聚該職業工作者的需求，那麼新聞工作該透過何種方式完成這項目標？當然，不必凝聚社群、不需成為專業也是一種選擇。

其次，在強調專業的年代，新聞工作雖然不似醫生具有合法壟斷專業的地位，但有意思的是，如同 Meyers, Wyatt, Borden & Wassermn (2012) 指出，以往資訊收集、新聞發行需要大量成本，得交由媒體組織專職負責新聞生產工作的事實，卻也實際促成新聞成為一種被壟斷的工作，加上以往新聞工作獨家擁有接觸資訊來源，以及發布新聞的管道，再共同促成了新聞專業主義的意識形態。過去，並非所有人都能稱為記者、新聞工作者，要確定某人記者身分的簡單方式便是確認他是否替被認可的新聞媒體所雇用，而過去政府單位便是認證媒體組織來發放記者證。

換個說法，在過去，媒體組織雖然傷害新聞工作自主，但也弔詭地透過生產實務過程中的壟斷，清楚界定了誰是新聞工作者。再配合著以往社會相對穩定、具有集體性、展現對於專業的信任，以及新聞專業對新聞工作者的號召，這些因素共同達成凝聚新聞工作社群的可能性。新聞成為一種相對穩定、封閉或壟斷職業，新聞工作者也才得以於其中蓄積實務式專

業能力，成為專業工作者。然而經濟、社會、科技因素組成的新媒體環境挑戰了這種原則。一方面，傳統媒體組織面對轉型、危機壓力，造成雇用記者人數減少、深度報導與獨家新聞減少、記者工作量增加，各種不利因素攪動了以往穩定的新聞工作環境，記者也失去以往累積實務式專業的機會。

二方面，技術的機緣加速公民記者與自媒體的出現，新聞產製工作雖然得以從傳統媒體組織解放出來（Meyers & Davidson, 2016），可是愈來愈多可能稱為記者的記者出現，社群媒體小編開始沿用編輯這個稱號，在在造成新聞工作的定義改變，更逐步瓦解以往穩定存在於新聞工作者間的社群感，也因此當下出現不少誰是新聞工作者？傳統新聞工作者與公民記者、自媒體記者有何差異，又有何優勢的討論。

三方面，各種新興的新聞學對應不同新能力，也意味傳統新聞社群的重組。資料新聞學需要使用電腦工具去收集、分析、視覺化資訊的能力，也需要與其他專業社群，如程式設計人員、社會科學家進行互動；創業新聞學強調記者個人擁有更多行銷技巧。然後 Meyers & Davidson（2016）敏銳地指出，以上改變不只涉及新聞工作的再專業化，更瓦解了傳統以新聞專業做為凝聚社群的方式，現在分裂成由不同行動者組成的各群專業主義的聚落（tribes）。在這種狀況下，無論是專業的想像或專業的實踐都得開始面對一組問題，即新聞工作還需不需要一個專業社群？如果需要，又該如何凝聚這個社群？或者，在專業瓦解後，我們又該如何看待新聞工作？不同聚落組成的新聞工作代表新聞工作可能走向何方？

陸、代結論

新聞專業的實踐本來便不容易，在台灣，不只同樣受到經濟、社會與科技因素的影響，新聞專業是移植的事實更是讓新聞專業在台灣實踐充滿困境。只不過就在移植讓台灣學術場域肩負更多使命的同時，無論學術場域是因為實務工作每況愈下的表現感到沮喪與失望；新科技、新議題聚攏學術研究注意，讓新聞專業這個老概念有邊緣化或教條化的趨勢；或者，受後現代跨界與混種影響，用敘事、大數據等概念重新定義新聞，反而忽略核心概念的討論，我們主張如果我們認為新聞專業還是具有價值，那麼

在經歷一段時間的存而不論之後，適時回頭複習老概念這個學術動作應該有其必要性，這個動作或許短期無法影響實務場域運作，但卻可能是重新凝聚台灣新聞學術社群的關鍵。而這也是本期以新聞專業做為主題的原因。蘇蘅教授〈新聞專業的視野：新聞實踐與台灣的問題〉一文，相當費工與系統化地帶領我們從「激辯中的專業主義」到「新聞專業主義在台灣」審視新聞專業這個概念。同時，蘇蘅教授智慧地利用道德勇氣與專業勇氣做為回應新聞專業實踐困境的作法，似乎呼應 Merrill 在存在主義式新聞學中的說法 (Merrill, 1996 / 周金福譯, 2003)。有時候，也許回歸單純的初心、理想、熱情，願意不順從於主流，是堅持專業主義的關鍵。當然，學術場域也應該具有這類專業勇氣，願意在主流研究主題、主流方法、主流立場之外，持續關心包含專業主義在內的古典議題，並且充分回應「對話」精神，用正直、誠實、開放，而非指導、批判方式與實務場域進行對話，如此，學術與實務場域才可能更加了解彼此，才不會各說各話。也許，在願意了解彼此，都沒有動氣的狀況下，學術場域將更能夠在專業實踐過程中扮演積極角色。

在以強調與倡議「改變」為主流的社會，當新聞不再是傳播系所學生的首選；當學術場域不斷推出各種新式新聞學；當各種不太新聞的新聞工作方式成為實務主流；當不讀書就去做記者的說法讓新聞系學生感到氣憤，那麼在台灣，該如何重建或強化新聞教育是件重要事情，但在急於重建之外，或許適時重新複習新聞的定義，重新回到專業主義的初心是邁向未來的重要一步。

本期以專業主義為主題概念，如前所述，蘇蘅教授〈新聞專業的視野：新聞實踐與台灣的問題〉一文，在社群媒體快速興起，影響新聞工作者態度與行為的前提下，帶領我們理論化地回顧西方新聞專業主義的理念，並且明白點出自主做為專業價值的重要性。其次，本文對應台灣政治經濟環境，說明新聞專業主義引進台灣與轉化的過程，以及專業實踐經驗的觀察。最後，蘇蘅教授主張重建新聞專業時納入「專業勇氣」這個概念，用開放態度重塑危機中的專業概念。另外，在因故缺少一篇主題稿件的遺憾下，本次編輯室報告也用較長篇幅，學術式加入新聞專業主義的討論。

本期有三篇一般論文。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羅彥傑副教授〈檢視老人

玩數位遊戲之研究：批判與敘事的觀點），透過既有研究的理論建構式分析發現，相較於兒童青少年數位遊戲的研究傳統，以老人玩數位遊戲為主題的研究數量不多，而且既有研究多數強調「健康促進」構面，「身體」是這些研究關切的焦點，另外，呈現一種「衰退敘事」。作者主張，傳播學門應多投入老人數位遊戲的研究，並且促成以「素養敘事」等正面敘事取代「衰退敘事」，讓老人數位遊戲研究能夠百花齊放。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博士生金麟〈年輕世代的行動攝影實踐與美感想像：以 Instagram 使用者為例〉，探討行動攝影這個新議題。作者透過後現代美學與媒介實踐脈絡主張，Instagram 使用者的攝影實踐深受拍照工具與生活型態影響。雖然行動手機具有無時無處皆能拍照的可能性，但使用者在 Instagram 記錄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特殊時刻，並且透過智慧型手機與圖片編輯軟體搭配出的行動攝影特徵，進行美感的完成，最後創造一種日常生活美學和藝術美學的交織狀況。

佛光大學傳播學系何欣容助理教授則以〈自我觸碰更性感？重探 Erving Goffman 檢視 20 年雜誌廣告之身體動作、身體展示與性別意涵〉回顧了性別廣告這項研究傳統。作者透過內容分析發現，近 10 年、女性時尚雜誌與吸引力相關產品廣告中，女性模特兒出現裸露的狀況高於男性，且更可能出現功能性手勢以外的自我觸碰。作者指出廣告中自我觸碰的身體動作與裸露的身體展示同時出現時，可能為閱聽眾帶來自我物化之媒體經驗。

感謝本期各篇作者、編輯委員，以及審查人的辛勞付出。《傳播文化》需要學術圈同仁的繼續支持，歡迎各位來稿。我們也會持續努力編輯最好刊物，促成傳播場域之內，以及與其他場域間的對話。

參考文獻

- 何榮幸 (1996)。〈一個自主性新聞專業團體的誕生：記「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組織過程與實踐經驗〉，《新聞學研究》，52：95-108。
- 林照真 (2009)。《收視率新聞學：台灣電視新聞商品化》。台北：聯經。
- 周金福譯 (2003)。《新聞倫理：存在主義的觀點》。台北：巨流。(原書 Merrill, J. C. [1996]. *Existential journalism*. Blackwell Publishing.)
-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 (2008)。《關鍵力量的沉淪：回首報業解除二十年》。台北：巨流。
- 涂建豐 (1996)。〈編輯室社會公約運動〉，《新聞學研究》，52：35-48。
- 張文強 (2015)。《新聞工作的實用邏輯：兩種模型的實務考察》。台北：五南。
- 陳炳宏 (2005)。〈探討廣告商介入電視新聞產製之新聞廣告化現象：兼論置入性行銷與新聞專業自主〉，《中華傳播學刊》，8：209-246。
- 劉惠苓 (2005)。〈新聞「置入性行銷」的危機：一個探索媒體「公共利益」的觀點〉，《中華傳播學刊》，8：179-207。
- 錢玉芬 (1998)。《新聞專業性概念結構與觀察指標之研究》。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論文。
- 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 (1995)。〈傳播教育應該教些什麼？幾個「極端」的想法〉，《新聞學研究》，53：13-53。
- 蘇蘅 (2018)。〈新聞專業的新視野：媒體實踐與台灣的問題〉，《傳播文化》，17：16-51。
- 羅文輝 (1996)。〈新聞事業與新聞人員的專業地位：逐漸形成的專業〉，《台大新聞論壇》，4：280-292。
- 羅文輝 (1998)。〈新聞人員的專業性：意涵界定與量表建構〉，《傳播研究集刊》，2。
- Abbott, A. (1983). professional ethic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8, 855-885.
- Aldridge, M. & Evetts, J. (2003). 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professionalism: The case of journalism.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54(4), 547-564.

- Allison, M. (1986). A literature review of approaches to the professionalism of journalists.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1(2), 5-19.
- Alvesson, M., & Robertson, M. (2006).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The construction significance and effects of elites Identities in consulting firms. *Organization*, 13(2), 195-224.
- Barber, B. (1963). Some problems in the sociology of profession. *Daedalus*, 92,669-688.
- Barker, J. R. (1993). Tightening the iron cage: Concretive control in self-managing team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8(3), 408-437.
- Deetz, S. (1998). (Re)constructing the modern organization. In A. McKinlay, & K. Starkey (Eds.), *Foucault,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theory* (pp.151-172). London: Sage.
- Doolin, B. (2002). Enterprise discourse,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the organizational control of hospital clinicians. *Organization Studies*, 23(3), 369-390.
- Deuze, M. (2005). What is journalism?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ideology of journalists reconsidered. *Journalism*, 6(4), 442-64.
- Ettema, J. S., Whitney, D.C., & Wackman, D. B. (1987). Professional mass communicators. In C. R. Berger & S. H. Chaffee (Eds.),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pp. 747-80). Newbury Park, CA: Sage.
- Evetts, J. (2003). The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professionalism: Occupational change in the modern world.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8(2), 395-415.
- Freidson, E. (2001). *Professionalism: The third logic*. London: Polity.
- Greenwood, E. (1957). Attributes of a profession. *Social Work*, 2, 45-55.
- Johnstone, J. W. C., Slawski, E. J., & Bowman, W. W. (1972). The professional values of American newsme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6,522-540.
- McLeod, J. M. & Hawley, S. E. Jr. (1964). Professionalization among newsmen, *Journalism Quarterly*, 41, 529-38, 577.
- McNair, B. (2005). What is journalist? In H. de Burgh (Ed.), *Making journalist: Diverse models, global issues* (pp. 25-43). London: Routledge.

- Malin, N. (2017). Theoretical frameworks used in studying professions. *Social Work and Social Sciences Review*, 19(1), 7-30.
- Meyers, O. & Davidson, R. (2016). Conceptualizing journalistic careers: Between interpretive community and tribes of professionalism. *Sociology Compass*, 10(6), 419-431.
- Meyers, C. Wyatt, W. N., Borden, S. L., & Wassermn, E. (2012). Professionalism, not Professionals.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27, 189-205.
- Mintzberg, H. (1979). *The structuring of organization: A synthesis of the research*. Englewood Cliffs, NJ: Prince-Hall.
- Schudson, M. (1978). *Discovering the news*. New York: Basic Books.
- Waisbord, S. (2013). *Reinventing professionalism: Journalism and news in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Wilensky, H. L. (1964).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everyon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0, 137-158.